

# 中国教育的“新教伦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引发的“有端联想”

\* Author:221220089 崔博涵

在马克斯韦伯的这本经典著作中，韦伯主要探讨了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起到的重要作用，马克斯肯定了经济因素的根本地位，但强调他的研究是关于精神层面的作用。笔者在阅读和听讲的过程中，偶然注意到了一种同构性，这种情况似乎出现在中国教育中（此处“中国教育”是一种泛称，其实是以此为代表的东亚教育）。即中国教育的现状的产生有某种“内驱力”的作用。现加以简论。

马克斯认为“在任何文明、任何事业的背后都有着某种精神气质的支撑。”是为本文的理论基础。

首先是对两种观点的反驳。其一是教育问题的同质论，即认为中国教育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具有特殊性，只是“观察偏差”的结果。很显然，考察亚裔群体在欧美教育体系中的生存状况可以发现，思维方式的差异往往要到第二代才能完全消除，这证明了教育的差异性。

其次是一种类经济因素的考量，即完全是发展有限，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在学习人群中产生的“类经济行为”。这过分夸大了客观因素的作用，假设完全由客观因素决定，求一定而供不同，那么在教育资源较少的省份，应该整体呈现于更激烈于教育条件优越的省份的情形。事实不然，在教育发达省份，同人口前提下竞争反而更强，这说明不只是客观因素在起作用。

下面展开说明这种同构性。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中，资本主义精神将获得财富作为一种主要追求。其实这种将资本不断投入再生产而不是挥霍的观点极其类似中国学生对分数的看待。首先中国学生产生了一种“分数归属”的异化，分数不再是仅仅作为一种评价标准，而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独立的可积累的所有物出现。分数用于交换各种教育机会（这广泛见于各个教育阶段，如），而换取的机会又用于分数的“再生产”，即获得更多分数。大多数学生获得分数同样不是为了炫耀换取情绪价值，相反大量学生选择压抑自身的自豪感而掩饰自己的“分数成就”，有强烈的自我贬低倾向。而“得分”在很多情况下已经跳出了获得知识，获得职业能力，获得财富、社会地位等原初目的。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即分数（或者类似分数）不再作为评价标准或不再作为唯一评价标准的情况出现时，会出现普遍的迷茫现象，即手段代替目的，亦即将分数的自身积累作为了目的。

在韦伯的观点中，加尔文教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有“预定论”和“天职论”等，可以发现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教育中也类似出现。大量的学生并不否认努力（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下的一些“重复努力”）的作用是有限的，相反的，绝大多数人认同天赋的决定性作用。但激烈地竞争并未因此削弱，教育资源的分配也并没有自然分层。相

反，学生为了证明自身的天赋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产生了各种有失客观性的目的性极强的“多元天赋”论点，如“努力也是一种天赋”，“依靠努力获得竞争优势要高于依靠天赋”等等。一个明显证据是，在理工科学生中，有相当部分学生强调数学为唯一有作用的学科，并且只投入于数学的学习，对人文学科持有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必须完成的任务采取不正当手段完成而只为剩余精力用于数学，尽管这种选择并不利于上文述“原初目的”。我们考察这背后的心理动因可以发现，数学作为普遍认为最需要智力天赋的学科，学生对其的兴趣并不全源自其本身（易见，因为从结果来看，除去客观因素，有主观动力从事理论数学研究的群体少之又少），而主要来源于对自身智力天赋的证明。

另外，对于“天职论”，有一事例，在笔者高中期间，笔者的物理老师曾经让同学们反思为什么在没有要求且对其意义不认同的情况下，多数同学选择将实验报告的质量最大化。可以看出在大量学生观念中，自身的唯一合理行为即学习，这一观念产生，笔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考虑，认为来源于社会关系。在新教伦理中，天职的安排来自于“上帝”，但在这一语境中，并不存在具体的指派者，这里主观感受上的“本应如此”，其实因为这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要求。

对于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教育中的体现，其影响积极与消极难以评价且不便评价。但是，我们可以窥见这种同构涉及到除了资本主义化的其他领域，也就是存在某种范式。或者在还原论的观点下，这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或许有更本质的归因。